

找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 王宏甲

“2017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南仁东‘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号召全社会向南仁东学习。我在接到创作一部反映南仁东生平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任务之初，心中是忐忑的。我没有见过南仁东，也无法采访到了他。中国天眼是科技含量极高的大科学工程，我是外行，真的担心写不好辜负了这个光荣任务。我在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就去贵州天眼基地采访……”

在贵州天眼基地，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逐渐体会到了什么叫不朽。南仁东就活在他的同事们和学生们的生命中。我还采访了先前居住在天眼基地大窝凼里的农民，同样看到南仁东就栩栩如生地活在那里农民的讲述中……我感到，南仁东逝去了，他不朽的生命必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青少年继往开来，去创造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人生。”本文摘自《中国天眼：南仁东传》，有删节。

“在这个满地都是金钱的年代，我这些学生在看星星。”这是南仁东对他的学生最高的评价。建造FAST，似乎不是要观察宇宙，更像是带领我们审视自己的灵魂……当年中国的科技、经济条件都落后，能搞“两弹一星”吗？“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青年时听过的这句话重新回到南仁东的记忆里。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南仁东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我死了还会在这里转

“南仁东啊，南仁东，跟你做事就是难！”记不清这是哪年哪次在哪个洼地里继续选址，与南仁东共寒暑同跋涉，像哥俩了，聂跃平说话就随便了。

聂跃平告诉我，在用遥感技术反复搜寻、甄别、分析而建立起来的数据库里，从200米、300米到500米口径的“大坑”都各有几十个，加起来一百多个。南仁东坚持这一百多个都要去走。

“要是漏掉最好的，我死了还会在这里转。”他说。

聂跃平说自己想起了少年时记住的毛泽东赞扬白求恩的四个字“精益求精”，南仁东就是这样一个人。

十多年了，跑了安顺、黔南、黔西南一市两州的三十余县，还跑了毕节的黔西。所到之处，当地政府和群众都热情接待。可是南仁东怕欠人情，总是自带午餐，就是小饼干和小酸奶。聂跃平说他是“不食人间烟火”，因为饼干和酸奶是不用煮的。这也是为了节省吃饭的时间。

十多年了，从省长到村干部，从老人到儿童，很多人都认得这个有小胡子的科学家了。某次去大窝凼，有户人家生小孩，那小孩现在读高小了，“大射电”项目还没有着落。“人生有几个十几年？”聂跃平问南仁东。“你还年轻，我60岁了。”“要是最终没有结果，你我都废了。”“别说废话。”

在一起的时间多，夜里南仁东望星空，也会跟聂跃平聊起有没有天外的理性生命，聊起霍金的警告——要是探测到外星人的信号，千万不要随便回应……

获得“铁公鸡”称号

庞大的FAST工程的预研究、可行性论证



“中国天眼”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图

要请很多专家。由于长期处于缺经费的状态，南仁东总是尽可能找便宜的旅馆让专家住。因为方方面面厉行节约，南仁东获得了“铁公鸡”称号。在宾馆开会、吃饭是要钱的。南仁东还自带干粮——还是饼干，就像他在贵州大山里选址一样。你相信吗？

请专家论证，有国内外专家。吃饭除了宾馆的自助餐，总要请人圆桌吃一两次饭，边吃边谈，也联络感情。这时总是选择小房间，只安排南仁东一个人陪。

南仁东席间要抽烟，他说不影响大家，就出去抽，叫张承民进来陪大家。此时的张承民是南仁东的助理，FAST学术秘书，还充当翻译，按说怎么也应该有他一个位子，但是——“我们经常是两个人一个位子。”张承民说，“他出去抽烟。我进来帮助翻译和解答一些问题，顺便就吃一些。少一个位子，可以省一个人的饭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项目，节省到这个地步，你相信吗？

许多的事都让南仁东怀念起从前在通化无线电厂和大伙儿一起搞研发的岁月。那种图纸摆在车间里，大伙儿端着饭盒边吃边说的情景，他永远难忘……日后，当FAST终于开工，几千工人进场的时候，南仁东处在工人堆里是那么开心。他到工人的集体大宿舍，一屁股就坐在床上，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在脸上荡漾。他的博士生跟他一起去的，进去后转身就出来了，说“被那宿舍里的汗味熏出来”。可是，南仁东就喜欢那味道。你相信吗？

他的学生都说，南老师特别能吃苦，特别节约，跟工人关系好，特别平易近人。这些都是事实，但也许不容易理解——南仁东在与工人们的相处中有真正的快乐。

但是，2005年，这个项目还在路漫漫的“预研究”中。南仁东遇到的，还有超出经费、超出科技的困难。

与其说是刺激，莫若说是鞭策

在南仁东提出我国独立建造一台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方案，中科院在1999年支持启动预研究之后，南仁东就感到FAST遇到的困难逐渐复杂起来。

美国方面出现评说FAST过时的声音，接着，国内外就有呼应这些说法的声音。

南仁东给一位荷兰天文学家发邮件，讲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对方说：“不行。一个连汽车发

动机都做不好的国家，怎么能做‘大射电望远镜’！”

对方不是他的敌人，而是相识多年的朋友。这句话撞击到南仁东心里，产生的实际效果与其说是刺激，莫如说是鞭策。

今天，很多同事回忆说，那时候南仁东说自己：“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这句令同事印象深刻的话，在南仁东事迹展里被改造为“我开始到处游说，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事迹展介绍这个情节是这样描述的：

在南仁东提出建设FAST时，FAST项目独特的设计理念在早期并不能被很多人理解。国际上的一些天文学家对中国有偏见。

为了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大会还是小会，南仁东逢人就讲大射电项目。他满怀激情、不厌其烦地向不同的人解释FAST的每一个创新概念。用他的话说来说就是“我开始到处游说，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

中央电视台邀请他到《百家讲坛》讲世界上有关探测地球以外理性生命的内容，起初南仁东一口就回绝了。因为他一贯不愿意抛头露面，而且极舍不得时间。但考虑到可以向大家介绍大射电望远镜，他又答应了。于是，2004年5月6日，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寻找地外生命》。

靠一股劲支撑着

有人说，FAST代表了中国科技的长征。为什么？因为我们每走到一个地方，都在宣传FAST对中国科技创新、文化教育、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意义；因为我们一直在凝聚中国科技界、产业界顶尖的团队加入联手建造“大射电”的队伍中来。

从1993年得知国际LT计划开始，南仁东就自掏路费，从东北到东南再到西北，一家单位一家单位去谈，先后联络了全国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万山深处选址，贵州省的支持与合作，无数农民积极参与；开工后，参与进来的各路劲旅就更多了；竣工后，当地建起中国最好的天文馆，每年前往接受熏陶的青少年从数十万到百万计……FAST工程的艰辛挺进，像不像中国新科技时代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但是，2005年，主持FAST的南仁东还在困境中。

他像个保卫胎儿的孕妇，不断地跟各界人士说，这孩子将来是很有出息的。他说：通俗地讲，

大望远镜像猫头鹰的眼睛，那种很多小望远镜组成的阵列像蜻蜓的眼睛，各有千秋。蜻蜓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具有空间分辨率高的优点。FAST类似猫头鹰的眼睛，对微弱信号的探测灵敏度极高，理论上是目前能探测到最远天体的望远镜。做这个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对综合条件的要求也是最高最难的。

他不仅在国内奔走，还去国外奔走。在国内奔走的时候，坐在绿皮火车里，有人问他：“你是不是搞推销的？”他笑了笑，回答说：“是的。”

南仁东一向不要别人照顾，但跟他出差的张承民已经感到自己要照顾他。张承民发现南老师吃安眠药，不吃就睡不着，吃少了还睡不着，每天都是靠一种精神、一股劲，支撑着身体。

2005年春的一天，在去科技部的途中，南仁东突然在车里坐不住了，在后座歪着躺了下去。“胸部很难受。”他说。

南仁东从不叫苦叫累，有超乎常人的承受痛苦的坚忍。现在他说“很难受”，坐在前座的张承民立刻意识到不是小事，立刻对司机说：“去医院。”

平日，张承民也跟南仁东建议上过医院看看。“没时间。”南仁东总这样说。现在张承民“去医院”三字脱口而出，不容商量。司机叫宋喜良，是台里的老司机，也非常了解南仁东，立马就就往就近的中关村医院去。

到医院，医生开单去拍片、抽血化验，检查了一圈，然后得到一堆化验单和报告单，有的结果还没出来。

“没发现情况，是吗？”我问。“发现了，认为有情况，但不能做结论，需要专家会诊。”

“那就请专家会诊呀！”“那得交一笔钱，然后请大医院的专家来会诊。”

既然如此，那不如直接上大医院。于是，宋和张两人都不容南仁东说“算了”，开车直接去了北医三院。

北医三院是三级甲等医院，日均门诊量近一万人。这里看病的人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排着很长的队。南仁东一看就说：“走走走，没法看！”……于是回去了。

后来，张承民说自己陪南仁东去过两次医院，都是车走在半路上，南仁东觉得不行了，顺道就拉他去的医院，但最后都因为没有时间等，没有看成。

“我后来回想，”张承民说，“南老师生病不是在2015年查出肺癌的时候，他至少2005年就有情况了。FAST是个有挑战性、冲击性、超越性的项目，他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他是长期疲劳不堪，积劳成疾的。他自己其实有感觉，但他怕一旦查出大问题，那FAST怎么办？他能躲就躲。每次都是特别难受，痛得喘不过气来，感到过不去了，才同意上医院。可是缓过气来，还没轮到他看病，就又走了，不看了。”

张承民在告诉我我这些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满眼都是当时的南仁东，所谓“历历在目”。



《中国天眼：南仁东传》
王宏甲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读书·综合| 11

读书会

大师的青春修炼手册

■ 曾禾

近日，“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大师的青春修炼手册——关于成长、关于初恋”读书活动，在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办，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与爱好者共同分享了三位俄罗斯文学大师的自传体作品——屠格涅夫的《阿霞》《初恋》《春潮》，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此次推出的这三套自传体小说，既体现了作家本人的人格，又书写了俄罗斯人的性格；既写出了人物的内心，又刻画了时代的样貌。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教授以“俄国文学中的三个三部曲”为题，与现场读者分享他对这三套作品的解读：“这几本书都是经过时间检验和读者筛选之后留下的名译，它们就像陈年旧酿，散发着由文字和时间共同酿造出的芬芳。”他认为，以自传体这一体裁为切入点，以三位文学巨匠的诞辰纪念为时间窗口，请中国俄语文学研究界的三位专家作序，再加上精装的封面、烫金的作家签名、浮雕一般的作家头像、精心编制的人物关系卡片、精美的插图，令人眼前一亮。

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张建华教授重点品鉴了屠格涅夫自传体小说《阿霞》《初恋》《春潮》中的爱情主题和女性形象。在他看来，在三位作家的诞辰纪念年，以单行本形式再版他们的自传体性质作品，是个很好的选择。不仅因为有纪念意义，更因为自传体小说本身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具有唤回人类生命诗意的巨大力量。而且，非虚构的真实与深刻，赋予文学以巨大的情感力量的同时，还担负着重建文化、张扬人性、灵魂再造和唤回美德的重要功能”。

以屠格涅夫为例，他不仅是俄罗斯历史风云的“编年史家”，同时也是“俄罗斯的爱情文学中最早开启爱情书写的作家”，更是人类生命价值、爱情真谛、人性和谐的追索者。在三部中篇小说《阿霞》《初恋》《春潮》中，屠格涅夫以生命的脚步和心灵走向双重苦旅的方式，来言说他青少年时代的爱情经历，塑造了阿霞、齐诺奇卡、杰玛三个动人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是高度自由的、独立的，在爱情中“仅仅听凭心灵、情感的驱使”，而且“有勇气独自去拥抱爱情中的不幸与苦难”。最重要的是，作家没有因为不成功的爱情而陷入“简单的伤感和挽救”，而是通过展现男女主人公伴随着爱情的波折而成长、成熟，真挚地咏赞爱情的价值和美好的人性。

张建华教授认为，中国读者比较熟悉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相比之下，“屠格涅夫这些生命的记忆之声似乎显得微弱，常常会被忽视、淹没或悬置。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更，这一被记忆激活的青春爱情书写，却愈益显示出其独有的风采和魅力。”



三位俄罗斯作家自传体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颗赤诚爱国心 李公朴

据新华社南京电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北区公朴路东村129号，坐落着李公朴故居，该故居坐北朝南，修筑后共三进，为砖木结构。二进的平房花厅，如今已被改建成李公朴事迹展示厅，中间是李公朴的半身石像。两边彩旗招展，四面墙上是事迹展板。看着一张张图片，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感受



李公朴像。新华社发

到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了天下人的大安，不顾个人安危、一争到底的一腔热血。李公朴，祖籍江苏武进，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爱国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幼时家境贫寒，中学期间勤奋好学，富于正义感。五卅运动期间积极参加上海学生罢课游行，还曾回到家乡湖塘镇联合工商学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五卅运动后援会”。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李公朴投笔从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他幻想破灭，愤然离开军队。1928年李公朴赴美国留学，其间应邹韬奋邀请兼任《生活》杂志通讯员，考察美国国情，撰写海外通讯30多篇。1930年回国。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公朴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1938年初，应阎锡山之邀，到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同年7月，将《全民周刊》与

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从1937年8月到1940年11月，他在抗日战争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前往华北抗日前线，从事战地教育，为团结抗战奔走呼号。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公朴积极争取和平民主。他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将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编《民主教育》，组织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积极开展活动。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重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等60余人被打伤，送进医院治疗。他对夫人张曼筠说：“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在云南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业奉献了生命。“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生于飘摇乱世的李公朴，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生命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1996年7月12日，在李公朴殉难50周年纪念日之际，为缅怀烈士英灵，武进市人民政府和湖塘镇政府共同拨款，重建故居的花围墙、头进厅屋、后进三间楼房。1997年底，原址修复。

作为常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李公朴故居每年都会迎来周边学校学生、社区居民等进行参观学习，部分学校的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也在此举行。

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战斗英雄

新华社合肥电 在安徽阜阳革命烈士纪念馆内，有一面名录墙，镌刻着2000多位阜阳英烈的姓名，战斗英雄王克勤的名字也在其中。

王克勤，1920年生，安徽阜阳县人。1939年7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被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解放军后，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培养下，王克勤迅速成长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王克勤毙伤敌人232人，俘虏14人，缴获步枪8支，9次立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模范共产党员”。

1946年9月，王克勤被提升为班长。他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班里每补充新战士，他总是现身说法，启发新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他用“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的格言，教育大家搞好团结，并组织两个互助小组，开展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活动，对提高班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很大作用。

1946年10月6日，在山东巨野县徐庄阻击战中，王克勤带领全班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歼灭大量敌人，全班无一伤亡，圆



王克勤像。新华社发

满完成任务。战后，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3人被评为战斗英雄。王克勤被任命为排长。同年1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号召全军部队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他的“三大互助”带兵经验迅速在全军推广，对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部队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7月10日19时，第6纵队打响了进攻定陶城的战斗，王克勤率全排担任定陶北门攻坚突击任务。战斗中，王克勤身负重伤，但他仍咬紧牙关坚持指挥战斗，率领战士奋勇登城。

11日凌晨，王克勤因失血过多，英勇牺牲，年仅27岁。为纪念他，他生前所在的排被命名为“王克勤排”。中共定陶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县城北门改名为“克勤门”。

王克勤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野战军总部后，刘伯承司令员激动地说：“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随即他以自己和政委邓小平的名义，亲笔给王克勤所在部队发去了唁电，称赞他是“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我全军所学习的新进步的范例”。

王克勤

忠贞国事大丈夫 张漫萍

据新华社郑州电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刻有“张漫萍烈士之墓”几个大字的方形墓碑静静地矗立在这里。碑前安放的鲜花，代表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敬意。除了烈士的家乡荥阳，在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还矗立着一座张漫萍烈士纪念碑。英雄已逝，但精神永续。



张漫萍像。新华社发

张漫萍，1910年出生，河南荥阳人。1926年夏至1932年春，在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到北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7月，因叛徒告密被捕，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在狱中，张漫萍在薄一波、杨献珍等同志领导的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敌人对张漫萍威逼利诱，酷刑拷打，逼迫他写所谓“悔过书”，自首叛变，甚至以枪毙相威胁。张漫萍向党组织表示，宁死狱中，决不屈服，“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叛变，誓死不投降”。他义正词严地斥责反动当局：“我抗日无罪，无可后悔”。经过狱中斗争的严峻考验，1932年冬，张漫萍被狱中党支部批准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狱中党支部成员。

1936年9月，张漫萍经党组织营救出狱，随后被分派到河南工作，先

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共兴华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郑（州）密（县）荥（阳）工委书记兼荥阳县委书记、中共郑荣密地委委员，在开封、荥阳、西华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各阶层群众，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开辟西华抗日根据地。

1938年底，张漫萍转赴豫皖苏边区，到新四军4师彭雪枫部工作，先后任第2总队营长、4师司令部作战参谋。1942年至1944年，张漫萍调安徽淮北，先后担任中共泗（县）五（河）灵（壁）凤（阳）县委宣传部长，中共蚌埠工委书记兼城工科科长。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担任中共蚌埠工委书记，带病转战于安徽淮北、江苏洪泽湖一带，领导这一地区党的地下斗争。

1947年7月，张漫萍在安徽固镇县五河集一带开展工作时不幸被捕。敌人把他吊在梁上，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怒斥敌人：“共产党是杀不完的！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当夜，凶残的敌人把张漫萍勒死，装入麻袋，投入浍河，张漫萍壮烈牺牲，时年37岁。

中共荥阳市党史室党史室副主任花金伟说：“张漫萍烈士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也是革命的、战斗的、光辉的。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